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传承实践如何协同进步

“器载河山 吉大传承——考古文博与世界文化遗产论坛”综述

肖凤娟

8月12日，由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联合主办的“器载河山 吉大传承——考古文博与世界文化遗产论坛”在吉林大学举行。论坛旨在积极探索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传承实践的协同进步之路，进一步推动考古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论坛分主旨讲座和主题研讨两部分。

主旨讲座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成就、经验与展望”为题作论坛主旨讲座。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段天璠主持讲座。

讲座系统回顾了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的发展历程。40余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历经起步探索（1985—1994）、加速推进（1995—2005）、转型发展（2006—2011）和创新引领（2012至今）四个阶段。截至目前，我国共有61项世界遗产，包括42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从起初学习国际规则、引入《威尼斯宪章》等核心文件，到本土保护理念体系逐步成型，再到2004年苏州首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2005年西安设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二级机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遗产治理的步履从未停歇。

关强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以“三个有利于”作为申遗工作的重要遵循；坚持保护第一，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统筹保护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加强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等核心要求。关强认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世界遗产保护、重点保护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重视申遗与强化保护管理、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升保护能力与交流互鉴能力六个重要关系，在保护与发展良性循环中全面提升能力、回应时代需求。

世界遗产仍是文化领域重点工作，受到中央、各省市高度重视。2024年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启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专项行动”，强调构建遗产“大保护”格局。申遗成功的关键在于深挖遗产独特价值，所有工作必须扎根基础研究，以价值阐释为根基。目前，“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正稳步推进，“江南水乡古镇”“木拱廊桥”“红山文化遗址”等预备项目持续培育，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前期工作有序开展，中国世界遗产事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主题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文化遗产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以人民性为引领的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两大主题展开研讨。张治强、王月前分别主持了研讨。

中国文化遗产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历经近40年快速发展

展，但与之匹配的理论体系与学科框架长期依附于考古学、建筑学等既有范式，构建一套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中国命题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共识。

杭侃提出，构建中国文化遗产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性，源于两个层面：一是遗产类型的本土性，二是管理实践的中国式难题，如多头管理体制与超大规模游客流量带来的现实困境。这些特殊性问题决定了中国文化遗产无法简单套用外来理论。最紧迫的任务是厘清文化遗产学科与考古学的关系。考古学的传统定义聚焦于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并未涵盖保护、管理和利用等环节。因此，应当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加强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等相关专业建设，使之与考古学形成互补。

杜晓帆认为，构建中国文化遗产自主知识体系需立足本土海量实践提炼理论，立足本土特有现实问题形成问题意识，立足多元复合价值重构本土价值体系。文化遗产学区别于考古学、博物馆学、建筑学和民俗学等传统相邻学科，拥有遗产价值理论、遗产整体保护理论、遗产制度管理理论和遗产传承理论四大核心理论板块。文化遗产要发展为独立学科，不仅需要理论体系的支撑，更需解决人才培养与行业认可的现实问题。

史吉祥认为，高等教育需解决供给与需求的匹配问题。在AI时代，要培养学生辨别真伪、辨别是非的能力，“获取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针对博物馆专业学生就业困难这一问题，应找到博物馆的核心技术与技能。建议文化遗产学细分专业领域，并设立专门的“博物馆学研究所”，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和结合点。

谢群提到，伪满皇宫作为日本侵华与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其保护利用面临价值阐释的特殊性与“保护什么”的边界难题。实践中，伪满皇宫博物院从四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通过口述史访谈和历史文献梳理，将价值定位于“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二是总结出“原状展示、最小干预、预防性保护”的保护体系，并部署数字化监测；三是构建“警示—借鉴—启迪”三层阐释逻辑；四是以遗址博物馆联动历史文化街区，开发行走线路，让文化遗产转化为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空间。

蒋璐谈到，文化遗产学与考古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于两者共同围绕文化遗产价值的分析阐释展开。两者的协同发展，需在人才培养、品牌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四个方面统筹推进，让学生实现从学习知识到服务社会的转变。通过构建中国文化遗产知识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感知层面的国际传播走向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

以人民性为引领的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实现以人民性为引领的中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博物馆工作的重大课题，也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方向。

吴诗中国谈“人民性”与“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两个关键词展开发言。关

于人民性，他提出文物虽是劳动人民所造，但展览中鲜有工匠姓名标注，建议运用叙事性设计，注重文物原生环境营造，还原瓷器成型、上釉、烧制等工艺过程，让人民创造历史的主题得以彰显。博物馆高质量展览的标准是让群众“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学到知识、留下记忆”。当前博物馆存在千馆一面，缺乏叙事逻辑，新技术运用不当，形式设计过于追求黑空间、暗环境、酷和炫等问题。可以以叙事创新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交互体验，以艺术手法打造“有温度、有情感”的展览，实现博物馆与人民同行、与历史共叙、与科技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陆建松认为，博物馆应关注儿童、老年人和特殊群体需求；要结合国情而非照搬国外模式；公共财政支持的博物馆不应以营利为导向，商业展泛滥现象须纠正；展览要做到“专业通俗化、知识趣味化、复杂简明化”，避免千篇一律、知识传播碎片化等问题。博物馆首先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国民教育阵地”，首要使命是“以史育人”，而非旅游或营利机构。

刘毅提出，博物馆应守住主责主业，在时代潮流中保持清醒。展览应注重展品内涵解读及关联性阐释，关注“加点水、加点糖”的传播技巧，让不同观众接受和理解。关于新技术应用，主张实事求是，警惕“为技术而技术”的倾向，避免盲目投入。学科建设上，直言评估体制存在不合理性，呼吁坚守学术初心、不被利益裹挟。

李中原结合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实践案例，坦诚分享“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切身感受。面临“怎么能够活下来、怎么能够生存”的严峻考验，坚守“让单位好、让人好、让公众喜欢”的初心，制定“321”工作模式：三种教育——自然教育回应人与自然、劳动教育回应人与自我、科学教育回应人与社会；两个坚持——坚持开门办学，融入行业；坚持开源节流，广泛寻求多方支持；一个主题——以人民为中心，“老百姓喜欢啥就干啥”。通过建设昆虫实验室、园区种树、废墟种地、库房面向公众开放等创新举措，实现博物馆参观量的提升。

吕军认为博物馆发展应注重区域均衡性与服务均等化，在增量控制与布局优化中兼顾不同地区公众文化需求。关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博物馆人民性理念，一是紧跟时代潮流、服务社会发展，二是强化行业协同，深化馆校合作，构建联合培养机制。高校文科人才教育应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

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文化遗产地管理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世界文化遗产地及博物馆一线的众多专家学者与实践管理者。论坛的成功举办，为高校与文化遗产地之间、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搭建了有效的沟通桥梁，对推动考古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石上晋阳：太原佛教石刻造像的展览与阐释

贾晨



石雕供养人立像 天龙寺遗址出土

山地区造像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展览中的唐代罗汉头像、胡人头像、供养人立像、红彩供养人像、佛坐像、菩萨头像、天王像等类型较为丰富，既反映唐代佛教图像体系的复杂性，也呈现唐代造像对世俗形象和人物神情的吸纳。

学术界通常将以天龙山石窟为代表的、形成于北齐晚期至初唐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风格概括为“天龙山样式”。这一概念在20世纪国内外佛教美术史研究中逐渐形成并获得广泛认可，用以指称天龙山石窟在人物造型、衣纹处理、空间塑造等方面所呈现的独特艺术风貌，以及其在北朝向盛唐造像演变过程中的承前启后作用。此样式的形成与晋阳在唐代政治、交通和信仰格局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唐高宗、武则天曾巡幸并州，武周时期并州置北都；同时，五台山文殊信仰兴盛，晋阳成为两京僧侣巡游礼谒五台山的重要通道。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天龙山石窟开凿和造像活动的历史背景。天龙寺遗址出土材料不仅可以说明一处寺院的历史，也能帮助后人理解山西佛教艺术如何在全国交通与信仰网络中获得自身面貌。

展览中还有关于天龙山石窟海外流失造像复制品和第8窟回归佛首的内容，也使天龙寺遗址的阐释具有更强的当代意义。天龙山石窟造像曾长期面临流失、分散和残损的问题，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回归祖国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使公众重新认识到石窟寺保护、流失文物追索和数字复原工作的价值。将这些内容纳入展览，不仅丰富了天龙山造像的艺术史叙述，也把观点引向文化遗产保护这一现实议题。

从遗址到展览：建立可理解的公众叙事

由遗址入展厅，由残件见整体。“太原出土佛教石刻展”的价值，不只是把精品造像集中呈现出来，更

在于把分散的考古材料、遗址信息和艺术史问题组织成一条可理解的参观线索。在有限空间中呈现北朝至唐代的史跨度，必须处理好“点”与“线”的关系：童子寺遗址提供北齐晋阳佛教造像的发生现场，天龙寺遗址则提示天龙山造像传统的延续与成熟，两者共同支撑起展览的主要叙事。

以图表定时空，以复原接原境。展览需要把“遗址信息”转化为观众能够理解的展示语言。文物、图版、文字、表格、辅助陈列、3D打印复制品和现场影像资料在这里各有作用：分布图和纪年表帮助观众建立空间与时间坐标；童子寺遗址相关内容把出土造像放回山地佛寺格局之中；天龙寺遗址及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复制展示，则把造像艺术、文物流失、佛首回归和数字复原等议题联系起来。由此，展览不再只是按时代排列文物，而是引导观众理解文物从哪里来、为何重要、与哪一段历史相连。

见文物，也见现场；看造像，也看遗产。这样的叙事方式保留了出土造像的遗址属性。文物进入展厅后，并不意味着其与出土环境的关系被切断；通过展览文本、现场图版和空间设计，观众能够理解文物与寺院空间、山地环境和石窟寺保护之间的关系。围绕童子寺遗址，可以讲清北齐晋阳佛教造像的历史背景和地方化特征；围绕天龙寺遗址，可以讲清天龙山造像传统的延续与成熟，以及文物流失与回归、数字复原和石窟寺保护等议题。

从审美走向认知，从观看走向理解。这类展览的重点不应停留在“精美”“震撼”等审美描述上，而应把考古发现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历史叙事。未来，相关展示还可继续完善展签、图录中的考古信息，突出发掘年代、出土地点和遗址背景，并适当增加同类造像的局部比较图，使观众在观看造像的同时，也能理解其背后的遗址、时代和保护意义。

石刻无言，却记录着晋阳的城市兴衰、佛教传播和艺术创造。童子寺遗址与天龙寺遗址一前一后，分别指向北齐晋阳佛教造像的兴起和天龙山样式的延续发展。通过展览，出土造像被重新组织、重新阐释，也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对于太原地区而言，这批佛教石刻造像不仅是珍贵文物，更是讲述晋阳历史、展示山西石窟寺考古成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的重要资源。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石雕佛头像 童子寺遗址出土

图片报道



“鲁迅在广州——广州鲁迅纪念馆藏经典连环画原稿展”近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厅展出，系统展出由广州鲁迅纪念馆《鲁迅在广州》连环画创作组创作的连环画原稿、创作底稿与跨媒介衍生作品，完整呈现1976年版《鲁迅在广州》的生成全貌。

20世纪是中国连环画蓬勃发展的时期。鲁迅先生重视连环画的艺术与社会价值，在他的倡导下，连环画摆脱了消遣的单一属性，实现艺术升华。鲁迅的文学作品长期是连环画的核心创作素材，讲述其生平的事迹类连环画不断涌现。本次展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合作举办，是这套原作首次来京与观众见面。图为观众近距离感受原稿的精彩笔墨。

（渊墨/摄）